

历史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多棱镜与万花筒。我们看到什么样的历史图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色盲”！本书呈现了一个多彩的北洋。

最后的 北洋三雄

张作霖 吴佩孚 孙传芳殒命秘闻

● 康狄 著



YZLI0890162887

最后的 北洋三雄

张作霖 吴佩孚 孙传芳殒命秘闻

● 康狄 著



YZLI089016288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北洋三雄：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殒命秘闻 /
康狄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012-4210-8

I. ①最… II. ①康… III. ①张作霖 (1875~1928) 一生
平事迹②吴佩孚 (1873~1939) 一生平事迹③孙传芳
(1885~1935) 一生平事迹 IV. 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66561号

责任编辑
文字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胡孝文
王 菲
刘 喆
张 琨

书 名

最后的北洋三雄——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殒命秘闻

Zuihou De Beiyang Sanxiong — Zhang Zuolin, Wu Peifu, Sun Chuanfang
Yunming Miwen

作 者

康 狄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电 话

010-85119023 (编辑) 010-65265923 (发行)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20 × 1020毫米 1/16 14印张

字 数

300千字

版次印次

2012年1月第一版 2012年1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210-8

定 价

24.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三场刺杀，北洋军阀时代的落幕

这本书是无心插柳的成果，虽无心却也倾注了我很多的心力，也带给我很多的体味和收获。

季我努学社创作的《卧底：解密“余则成”们的潜伏档案》一书在世界知识出版社付梓之后，受到了市场的欢迎和读者的肯定，我的好友世知社1934工作室主任胡孝文希望我们再接再厉，写作《卧底》的姊妹篇，因此，就有了《刺客：解密“风声传奇”背后的刺杀故事》一书的问世。

如果说《卧底》还没有完全地贯彻季我努学社“揭露日本战争罪行、讴歌中华民族的脊梁、为国内的二战史研究作贡献”的宗旨的话，这一宗旨在《刺客》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在《刺客》一书中选取的刺杀大案，都是刺杀汉奸、日寇的，或者说是被日寇刺杀的中国政要事件。在《刺客》一书中，北洋军阀最后的三巨头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的刺杀故事，都是由我操刀完成的。由于本人写作喜欢搜集尽量多的材料，写着写着，我就发现自己越写越多。单单这三个人的故事就可以构成一本书了，所以就有了这样一本专门论述北洋政府最后的军阀巨头死因的书。

我之所以将这三位北洋巨头的撰写任务留给自己，是有原因的。

一来是我对于近代军阀史比较酷爱，无论是像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等进入第一梯队的大军阀，还是像割据胶东的刘珍年、在河南内乡一带称王称霸的别廷芳等小军阀，都有一定的积累，史料上不是太生疏。

或许，以后我会专门写一本军阀列传，从掌握国家权柄或数省地盘的诸如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蒋中正、冯玉祥、李宗仁等头等军阀，写到诸如刘湘、杨森、李景林、张宗昌、陈树藩等掌握一省，至多两省地盘的次等军阀，再写到李家钰、井岳秀、刘珍年、别廷芳等掌握一省部分地盘，

甚至只有几个县的小军阀。

中国近代的军阀史，异彩纷呈，陈志让先生在《军绅政权》一书中，对他们的群像，曾有过粗线条的勾勒。这个群体，有很多的共性，比如都想争地盘、扩充部队以保留权位；也有很多的个性人物，比如为读者熟知的姨太太成群的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东陵大盗孙殿英等，其实像他们这样的人物，或者这些曾经主导过中国发展走向的群体的个性语言和传说不胜枚举。

本书秉持的写作态度是“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希望能够写出这三位军阀巨头的血肉，而不是仅仅给读者一个印象的骨架。因此，在本书中，读者可以看到这三位末代北洋军阀巨头脍炙人口的经典故事，也能够看到他们鲜为人知的真性情的一面。

二来，这三位在当权或是下野之后，都受到过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但他们都算是站稳了脚跟。对于将日本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张作霖、誓死不出山充当日本人傀儡的吴佩孚的民族气节，我比较景仰，在民族大义上面，他们基本上没怎么动摇。而五省联帅孙传芳正是因为要躲避各种势力的政治纷扰，才潜心礼佛，希望在化外寻求心灵的安宁，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在内心放下屠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经过多方寻找，都没有找到确凿的他想要充当汉奸的证据，我曾就孙传芳是不是汉奸这个问题专门请教近代军政人物的研究专家苏全有教授，他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我在这里说的是总体，希望不要有读者与我来计较他们在细枝末节上所谓“亲日”的行径，出于生存或者扩充实力的考虑，面对日本这个虎视眈眈的声称随时愿意援助的“强援”，他们或许会做出一些妥协。在这一点上，可能吴佩孚做得更加无可挑剔，因为态度比较坚决，他号称自己是“三不将军”：毕生不出国，不入租界，不借外债。他虽然请日本军事顾问，却从来没有经由顾问这条线，而与日本侵略分子勾勾搭搭。而说张作霖这个奉系军阀的首领不“亲日”，很多读者肯定要和我展开辩论，原因很简单——奉系军阀就是依靠日本起家的。这一点说得不错，也是事实，可是依靠日本起家，未必等同于愿意充当日本人的傀儡。利用日本人的力量壮大自己，再利用壮大的力量来抵制日本人，这正是张作霖在奉系当家的年头里做的事情。很多读者认可东北大部沦陷后，坚持抗战的马占山将军是“民族英雄”，甚至捍卫他，绝没有因为他曾经诈降日本人，骗取武器弹药之后，又反戈一击，而诟病他。张作霖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和马占山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读者在本

书中可以看到，张作霖在陈述自己对待日本的态度时，会有很多朴实的表达，这些表达会让每一个国人热血沸腾。正是因为张作霖不肯让渡国家利益，让日本侵蚀中国主权的阴谋得逞，日本激进派势力才会在皇姑屯布下死阵，夺去他的生命。我想姑妄大胆地说一句，如果让张作霖活到1931年，也许日本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少帅虽然在“东北易帜”和“西安事变”两件大事上堪称民族英雄，可是与他的父亲相比，在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方面，他还差很多很多。

孙传芳在名义上虽然从未做过北洋军阀的最高首领，他不像张作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成为北洋政府的末代元首，也不像吴佩孚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成为事实上的直系的老大，他只当到“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上还归吴佩孚和张作霖管过。但是，事实上，他的五省联军体系已经是直系势力最后的回光返照，其部队实力之强大，足以与扯虎皮当大旗的吴佩孚分庭抗礼，孙传芳也是有着问鼎中央政权的野心的。由于北伐来得太快，他迅速失败，所有才没有过多地向中央政权伸出触角。从这个角度来说，孙传芳跻身北洋军阀末代三巨头行列是理所应当的。孙传芳和张作霖、吴佩孚不一样，不是死于日本人之手，而是死于他在争霸过程中杀害的俘将施从滨之女施剑翘的枪下。因此，他的被刺案件充满着“孝女复仇”的传奇味道。我只是依旧史料，还原他被刺杀的整个过程，至于他是不是死于政治谋杀，还有待于新史料的发现。

在《卧底》一书中，我搜集了大量关于李克农的材料，写着写着，我发现我对克公越来越崇敬，我认为，克公就是情报战线上的周总理。哲学界有这样一种说法，研究康德的人，一辈子服膺康德的学说，一旦陷进去了就出不来了。我发现，我有同感。我从来都不否认自己是一个“笔端常带感情”的写作者，随着对张作霖、吴佩孚了解的深入，对于他们对付日本人的手段，我是非常欣赏的。张作霖出身胡匪，是一个老练的谋略家，而吴佩孚则有宁死不降的铮铮铁骨。我不能说自己有多么客观，因为只要是与日本侵略者对着干的团体和个人，只要他们在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方面不丧失立场，在我心中总能获得比较好的评价，作为抗日英雄，我欣赏他们的硬气！

在民国的乱世之中，能够作为顶级军阀在中国军界和政坛屹立不倒，是需要相当手腕和实力的。在北洋最后的三雄中，张作霖是最具枭雄气质的人，在不失立场的前提下精于算计、毫不教条，随时准备与异己势力妥协，以保

持和扩大自己的权力；秀才出身的吴佩孚则显得文人气质十足，遵循他服膺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儒家传统，宁折不弯，书生意气，显得略为刻板，他的这种刻板让他丢掉了地盘，也让他被日本人暗害；而有“笑面虎”之称的孙传芳也许是北洋三雄中最为阴鸷的人，却也不时袒露出真性情，在其洋洋得意之时，杀伐果断，不搞刘备那一套虚伪的纳降招数，可是暴发户的心态，最后也要了他的命。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的时候，天下英雄都不入曹孟德的法眼，枭雄曹操虽狡诈，却不虚伪，在我看来，假仁假义的刘备根本称不上英雄，关羽才更具英雄气质。

英雄也好，枭雄也罢！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决不可庸碌无为，狗苟蝇营，度过一生。对于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这三位北洋军阀末代的三巨头，我也不想作过多的评价，还是留给读者朋友去体味吧！

康狄

2011年7月10日于北京呼家楼

序 言

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

简评康狄之《最后的北洋三雄》

黑格尔曾说，历史可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存在过的史实，另一部分是历史学家对史实的叙述，即“藉人力以成之”的史籍遗存。前者不需要任何记载依然客观，而后者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完全客观。史学的求真，最好的结果是无限接近，却永远无法完全探究出历史的真相。这里的原因很多。但我个人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源自史实的复杂性和史学家认识的局限性。

历史的复杂性不仅是由于历史情境的复杂，而且还由于活动于其间的人也非常复杂，尤其是他们的性格与心理。人作为有思维有创造力的高级动物，肯定有着多面性，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对不同对象、不同事件，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道德判断、不同的价值追求，还会采取不同的人生态度、不同的处理方法等。更有甚者，现代医学还认为存在着具有双重性格的人，那是由于生理病变、精神紊乱等造成的病态，但当这种非正常人处于社会中时，人们也往往难以分辨其真实的人格。而对于史学家们而言，他们的认识会受到时代和情感的约束。时代的约束是指史学家们往往用他所处时代的直接经历作为标尺去度量过去，中国宋代的学者郑樵毫不留情地指出了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同样是以汉代的时代精神去考虑秦朝之事的。情感的约束是指史学家在描述历史时是带有自己的褒贬和偏见的。西方史学界有所谓“客观的”与“主观的”史学派的分野，中国也有“直书”与“曲笔”之分。但是，“客观的”史学派和“直书”难道就真的不带感情、不偏不倚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德国的兰克学派标榜的“实证历史主义”被美国史学家讽刺为“一个高贵的梦”；中国史学家公认的史家直书是公元前548年崔杼派人杀死国君鲁庄公后，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弑”字已经表达了史家的褒贬之义，可

谓一字定褒贬。“客观的”史学派和“直书”尚且如此，那“主观的”史学派和“曲笔”就更不用说了，肯定会离史实更加遥远。

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史学家们对历史作出的判定也往往是不尽全面的，对历史人物的判定就更是如此了。所以，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布洛赫，劝告自己的同行不要扮演任意褒贬死人的“阎王殿里的判官”。布洛赫的感慨是深沉的：“我们对自己，对当今的世界，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吗？”比如，长期以来，史学家对近代北洋军阀的看法几乎完全是负面的，如袁世凯独裁专断、压制民主、与日本签署卖国的“二十一条”、冒天下之大不韪称帝；张勋复辟、段祺瑞制造“三一八”惨案、张宗昌号称“兵多钱多姨太太多”的“三多将军”……人们往往认为这就是北洋军阀的群像而概不例外。

由于受国民党的正统史观的影响，加上有共产党革命史观的影响，史学家对于北洋军阀末期的张作霖、吴佩孚和孙传芳的评判，就更是“一边倒”了。三人大革命中要打倒的大军阀，他们的作为也为人们所诟病，如张作霖是杀害李大钊、邵飘萍、林白水的刽子手；吴佩孚残酷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残杀大批革命志士和进步工人；孙传芳割据东南五省，反对刘海粟在上海使用裸体模特写生……然而值得一问的是，这就是真实的张作霖、吴佩孚和孙传芳吗？他们身上难道就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康狄先生在这本书中为我们展示了三人的另一面，即他们身上也具有为我们民族所称道的东西——民族气节！张作霖坚决地抵制了日本的威逼利诱，暂时粉碎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图谋，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他已经成为侵略东北的绊脚石，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将之予以杀害；华北沦陷后吴佩孚坚持主权原则，毫不退让，屡屡挫败日伪阴谋终于招致了日本特务的谋杀。孙传芳在下野失势后拒绝了日本人提出的帮其东山再起的“好意”，为了躲避日本人竟然遁入佛门！

由此可见，我们对北洋军阀的评价并不全面客观，台湾作家李敖说：“比起国民党望风降日的巨头们来，军阀真是大义凛然了！”其实，我们对近代史整体的认识和评价都有片面性。在这种片面性下，不易探得的历史真相离我们就越来越远了，我们需要反思目前的史学评价体系。我国史学界，有很长一段时间，习惯于将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作简单的划分，如“三七开”、“四六开”等等，其结论往往离历史实际甚远。其实，在中国君主时代的传

统史学中，已经有些著名学者对历史人物的复杂性理解颇深。如王船山就是颇具史识的大儒，他极为明确地反对简化的两极评判，曾在《宋论》卷六中强调指出：“正邪存乎人，是非存乎言，功过存乎事，三者相因，而抑不必于相值。正者其言恒是而亦有非，邪者其言恒非而亦有是，故不可以人废言。是者有功而不必如其所期，非者无功而功固已施于世；人不可以废言，而顾可以废功乎？论者不平其情，于其人之不正也，凡言皆谓之非，凡功皆谓之罪。乃至身受其庇，天下席其安，后世无能易，犹且谪之曰：此邪人之以乱天下者。此之谓不思其反，以责小人，小人恶得而服之？已庇其身，天下后世以安之而莫能易。然且任一往之怒，效人之诃诮而诃诮之，小人之不服非无其理也，而又恶能抑之？”这番话堪称至理名言，而“平其情”与“思其反”更是史家必须注意的要领，否则，便难免“效人之诃诮而诃诮之”，难以寻求历史的公正。康狄先生的这本书在给予张作霖、吴佩孚和孙传芳公正评价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讨。

目前为人所公认的是，专业史学出现危机，正在被边缘化。是民众不喜欢历史吗？显然不是！当下各类历史讲座充斥荧屏，各种历史题材的故事充满网络，街头巷尾不时有人议论历史人物，似乎历史成为人们日常谈论的话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众关心历史的现象。那么这就显得有问题了：一方面历史受人们欢迎，另一方面史学却出现危机。出现这种矛盾现象，我个人认为这里有外界社会的误解在里面，但主要是史学家本身存在的问题。作为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历史工作者，研究的虽然是过去，但现实社会生活却要求他们必须立足于现实，直面现实。然而许多史学家却回避现实，他们或者把历史研究寄托于“发思古之幽情”，或者效法乾嘉考据学派，躲进象牙塔，向故纸堆讨生活。他们硬是要割断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使历史成为一无所用的死东西。经常见诸报刊的许多“考证”中，就有人不厌其烦三番五次的“考证”，对“关公用没有用过青龙偃月刀？”“关公的青龙偃月刀，究竟是长柄还是短柄？”等莫名其妙的问题大发议论。这哪里是在搞学术研究，分明是百聊无奈，玩起文人末路的把戏，要么是一种逃避现实的遁身法。其实，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是不可能完全躲开现实的，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是不存在的。史学研究必须走出深沉的书斋，作为“社会人”的史学家，理所当然地要关怀现实，关注社会。史学研究就某一方而说，是抚今追昔。抚今追昔，首先是抚今，触抚今天是追忆往昔的前提。这里，我们也看到某些

史学家，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过于偏重于对以往的追溯，而没有或很少面对现实，联系现实，寻觅现实社会的需要，把握社会的脉搏，关注社会的热点，抓住问题的关键，提出解决问题的答案。

专业史学要摆脱被边缘化的倾向，必须要进行创新，面向大众和服务大众，通俗史学可能是一条出路。所谓通俗史学，就是史学的通俗化、普及化、科普化，是史学工作者把某些历史内容搬出象牙塔，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利用现代化传媒与广大公众见面，并成为广大公众的精神食粮。与高深的专业史学研究相比，通俗史学更能顺应时代潮流，既可获得社会效益，又能获得经济效益，发展前景亦是乐观的。通俗史学有比较宽泛的社会基础和易接受性。通俗史学丰富多彩，形式灵活，语言生动，题材多样，适合各种文化层次的读者和观众。如人物传记、历史纪实、经典史籍白话译本、历史卡通画、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作，等等。类似作品一改传统史学著述的古板面孔，把艰深生涩的语言变得朗朗上口，突出了观赏性和可读性，通俗易懂，公众喜闻乐见。但是，通俗史学绝不等同于庸俗历史和娱乐历史，通俗史学本身是宣传、学习历史知识的一种形式，它虽在形式上可能简约明白、通俗易懂，但在历史知识的讲述上必须准确严谨，决不容吊诡随意；娱乐历史不具有任何的学术属性，其基本目的在消遣搞笑，为此往往不惜曲解甚或是杜撰历史事实；通俗历史有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属性，即它不完全为消遣搞笑的目的，亦兼具出于某种社会文化需要而演绎历史的目的，其中夹杂着它与文学的渊源关系，因此可以说它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范畴。康狄先生的这本书就属于通俗史学，在关键的史实方面表现了史学家的严谨，没有一丝随意，而在行文上却犹如白云流水，娓娓动听，让人万分着迷。他在书中从平民和通俗视角描述了张作霖、吴佩孚和孙传芳的英雄末路，使人无限遐想，三人跌宕起伏的往昔经历、日本侵略者的蛮横和凶残均跃然纸上！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张作霖、吴佩孚和孙传芳三人竟有两人死于日寇之手，可见日本侵略者对于侵略中国是不择手段的，这里会引出许多问题：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何如此凶暴？他们为何处心积虑地侵略中国？……这些彰显出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历史从来就是一面现实的镜子，研究抗日战争史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在千年以上的岁月中，充满着友好交往的美好回忆。按一些日本学者的说法，日本文化早期的发展曾饱含着中华文化乳汁的滋润。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又曾被几代先进的中国人奉

为变法图强的楷模，直到今人，仍有许多学者把日本当作亚洲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范例。但我们往往忽略了事物的另一面——历史事实昭示，正是现代化的日本，长期不断给亚洲邻国造成灾难，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和朝鲜。日本现代化的进程，从鄙视亚洲到效仿西方殖民主义的“脱亚论”开始；国力增强以后，打出“大亚细亚主义”的旗帜，转而以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为幌子竭尽全力称雄亚洲争霸世界。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在半个世纪里连续向中国发动三次大规模侵略战争：第一次侵占了中国的台湾，第二次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第三次从华北打到华东、华南、乃至华中、西南，野心勃勃地妄图一举灭亡中国。特别是历时八年的第三次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损失。然而，目前日本国内仍有一股右翼势力不甘心失败，且总是妄图重圆当年称雄亚洲、争霸世界的美梦。正是这些人千方百计推卸侵略战争的责任，美化当年军国主义的罪恶行径。此外，他们大肆排外，进行恐怖活动，宣扬法西斯主义。这种倾向与二战前法西斯势力抬头时的现象比较相似，应引起我们的警惕。

康狄先生的这本书，在史料上下了很大工夫，收集了许多专业资料，其所搭建的资料平台是广博的。这些资料有专业历史资料；也有通俗读物；既有大量中文资料，也收集或转引了许多外文资料；既使用中国学者的论著，也使用日本学者的作品；既有书籍，也引用了《史学月刊》等许多国内期刊论文；既有众多的二手资料，也使用了许多回忆录、档案等一手资料。可以说，这本书在资料上十分扎实，乃严谨的学术著作。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史学界一代新人换旧人。让我感到欣慰的是，现在有康狄先生这样有抱负的年轻人，相信必能将史学发扬广大！

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学博士后、教授 苏全有

2011年8月

目 录

前言 / 1

序言 / 5

枭雄之死

北洋政府末代元首张作霖殒命皇姑屯

张作霖是什么人？他是东北王，是北洋政府末代元首，还是杀害李大钊、邵飘萍、林白水的奉系军阀首领。但是，在日本人面前，他又是有着爱国心的中国人！他还是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往来资金的慷慨赞助者！

历史就是这般的吊诡！

为了壮大自己，他不惜利用日本消灭异己；但为了保全国土，他却要尽“赖皮”外交，“寸土”不让鬼子。用他的话说：“（日本）掐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做法！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想要了！”

不做卖国贼，日本人就真的要了他的“臭皮囊”！

但是，鬼子没有料到，皇姑屯一炸，也因此成就了大帅的英名——他是有底线的军阀！说得透彻些，在鬼子面前，他是个有种的好军阀！

也正因为皇姑屯一炸，少帅张学良有了“家仇国恨”，在西北攻打红军无望的他才发动了西安兵变，促成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并最终让鬼子彻底滚出了中国！

张作霖，堪称传奇！

枭雄的一生 / 1

没有“王牌”可出 / 3

玩弄日本人于股掌之间 / 5

“东方会议”为“去张”定调 / 8

掐着脖子要好处 / 13

回去之前 / 16

回去路上 / 19

在皇姑屯下毒手 / 23

日本人嫁祸南方革命军 / 29

被炸后的东北 / 33

双方的调查 / 34

张学良潜回奉天 / 39

张学良的回忆 / 42

关东军司令出现在葬礼上 / 44

被吓死了的田中首相 / 50

事实不容辩驳 / 54

为什么要除张作霖 / 58

是个有底线的军阀 / 64

真相！真相！ / 69

伟哉，上将军 吴佩孚宁死不当汉奸

吴佩孚，血性山东人，北洋后期直系首领。

尽管军阀混战，一败涂地，浮海南逃，但仍派头十足——头戴北洋五色星，卫队、行辕一应俱全。但当心怀鬼胎的日本人“送枪送钱”让他徐图再起时，他呵呵一笑，“如果我愿意借外债，引外援，何必待到今日。中国人的事情应该由中国人自己了结。……送客！”

“九·一八”事变之后，他质问世侄张学良：“国仇家仇你不报，你老子的棺材已经竖起来了，你怕抗日，我帮你抗日。……你有仇不报，笑话，笑话。”

拉他下水的人一拨接一拨，他不做梁鸿志！不做汪精卫！不做溥仪“第二”！土肥原让他讲话，见其手上是日本人的发言稿，大喜过望，但听到的却是

“中华民国应是保持领土完整和主权尊严的国家……”其客厅棺材一具，神位上书：吴佩孚上将之灵位！

不为奴，就得死。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逻辑。借为吴玉帅治牙病之机，日本人将其割喉，令人发指！

“得志当为天下雨，论文须有古人风。”这是他喜欢的诗句。他在文治和武功上都有建树。论气节，堪为“中国旧军人最后一个典范”；说文采，他也是儒将的典型。

民国军阀，因为有了吴子玉，格外的精彩！

一贯抗日的吴佩孚 / 72

棺材吓跑土肥原 / 80

装傻玩死大迫通贞 / 92

“谁跟汪精卫合作，这个人一定下贱！” / 96

软硬不吃，气死川本 / 101

身边的日本顾问 / 104

吴佩孚之死 / 113

吴佩孚葬礼 / 116

为什么不当汉奸？ / 120

儒将的日常生活 / 128

谪纬的行家里手 / 135

风雅之人 / 136

支持五四与挽救故宫 / 141

如何看待吴佩孚 / 145

放下屠刀未成佛 孙传芳血溅居士林

孙传芳，军阀巨头，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在光天化日之下，参禅礼佛之时，他被安徽桐城一弱女子一枪毙命。他的死，成就了民国义女施剑翘的美名。施、孙两家几番博弈，官司打到民国主席林森面前，最终以“特赦”收场。

孙传芳就这样白死了吗？！他是死有余辜吗？施剑翘是为父复仇，还是受命于军统？

冈村宁次是孙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时的教官，孙与之来往密切。孙曾聘他为军事顾问。哪知道，这个老师却从学生那里窃取一套我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的机密军事地图，受到日军参谋本部嘉奖，荣升大佐。从此步步高升，成了日本侵华的急先锋。

可否说，孙是人人得而诛之的汉奸呢……

这个孙传芳，可是值得人们一再地琢磨啊。

投身北洋 / 151

口蜜腹剑 / 155

牵头反奉 / 159

妄杀俘将施从滨 / 164

对抗北伐 / 170

施剑翘报仇 / 177

侠女传美名 / 184

“要人”出面得“特赦” / 190

孙传芳是汉奸否？ / 196

后记 / 202

梟雄之死

北洋政府末代元首张作霖殒命皇姑屯

张作霖，奉系军阀首领，赫赫有名的东北王。他由胡匪摇身一变成为清政府的军官，继而又摇身为北洋政府的封疆大吏，最后挥兵入关，成为北洋政府最后一任国家元首“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大元帅”。张作霖的兴衰沉浮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他毕竟是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他发展壮大之后，表现出强烈的摆脱日本控制的愿望。他经常给日本人画一个“大饼”，但事后总是借各种理由不予兑现，致使恼羞成怒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皇姑屯炸毁了他的专列，一代梟雄就此灰飞烟灭。

梟雄的一生

张作霖，字雨亭，奉天（今辽宁）海城人，1875年生。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赴朝鲜，路过黑山，张作霖投毅军当兵。由于他精明强悍，又善骑射，备受头领赏识，被升为哨长（连长）。^①中日停战后，毅军撤往关内，张离队还乡。张作霖先是在家乡当兽医，随后组织绿林武装，1902年11月被清政府收编成为新民府地方巡警前营马队管带（营长）。1909年奉天省地方部队整编，张作霖晋升前路巡防营统领（旅长）。^②

1912年6月28日，袁世凯下令将奉天中、前巡防队改编为陆军27师，任命张作霖为中将师长，张作霖从此正式步入北洋军阀大家庭。1916年春，张作霖逼走奉天将军兼巡按使段芝贵，被袁世凯封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正式任命张作霖为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一

^① 张明金、刘立勤，《中华民国历史上的20大派系军阀》，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第59页。

^② 同上，第60-61页。